

Research 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Museums and Schools

博物馆与学校的 合作机制研究

宋 娴 著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Research 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Museums and Schools

博物馆与学校的
合作机制研究

宋 娴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研究/宋娴著.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428-6320-1

I. ①博… II. ①宋… III. ①博物馆—联合办学—高等学校—研究—中国 IV. ①G269.2②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1820号

责任编辑 蔡洁 苏艳平 张嘉穗

装帧设计 李梦雪 杨静

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研究

宋娴 著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上海市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200235)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网址 www.sste.com www.ewen.co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25

版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28-6320-1/N·955

定价 36.00元

序一

PREFACE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的倡导和推动下,终身教育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育概念,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但迄今为止,关于终身教育体系化的构想大多只是停留在成人教育、社区教育等领域,很少涉及基础教育;而在基础教育改革领域,也鲜有人注意到终身教育的问题。最终,终身教育似乎成了游离于学校教育之外的专门领域,既无相互关注,更无协同行动。由于未能真正揭示终身教育的“基础性”和基础教育的“终身性”,所以,倡导终身教育的动议便不可能真正解决终身教育体系与基础教育体系相统一的问题,从而削弱了其对具体实践的解释效力。

无论是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是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都将“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作为我国教育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目前,最重要的是将思想、方针转化为实践,亦即真正建立终身教育体系。这不仅需要我们将“终身教育”视作一面透镜,反思我们对基础教育性质和功能的理解,也需要我们在新的理解之下重建基础教育,打破壁垒,在不同的教育之间搭建桥梁,确立其他各类教育的“基础性”地位,保障学校教育的“终身性”;以学校和其他社会机构为核心,构建学习型城区、学习型社区,以社会力量为核心构建学习型组织,由此,最终构建起“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毫无疑问,研究如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搭建起不同教育之间的桥梁,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不仅是因为很少有前人的足迹可供参照和借鉴,也是因为这一课题自身颇有难度。这种难度首先表现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庞杂,如何选取恰当的领域和分析维度,以此重构基础教育,构建新型的教育合作关系,使其既不泛化,又能集中体现终身教育的旨趣,并非易事。其次,研究者不仅要熟悉基础教育,还必须充分了解某一特定社会机构、组织所能发挥的教育职能;在理念向现实转换的过程中,研究者还必须对管理隶属、利益冲突、激励评价等现实问题进行充分的剖析。第三,将这种研究的尝试与当前学校教育领域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则是更为困难的事情。

然而我十分欣喜地看到,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研究》对此进行了弥足珍贵的尝试。该书在终身教育理论的观照下,从科学教育、科学传播领域着手,探究

了在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中,博物馆与学校如何进行合作以及现有合作的进展。从研究方法来看,本书体现了与终身教育相称的国际视野及现代性。研究充分考虑到了两种不同组织机构合作可能存在的障碍及复杂性,在规范的调研基础上,通过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演化博弈论及其他定性和定量分析技术,将一个宏大的命题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研究命题。无论是对基础教育学科还是科学教育学科,这些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见微知著。可以说,宋娴博士在本书中对博物馆与学校合作的研究,为我们呈现出中国终身教育体系的一个具体形态,这既弥补了基础教育研究领域中的一项空白,也为终身教育从理念到现实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事实上,受制于中国教育决策的惯性思维以及不同社会教育机构隶属的管理部门条块分割的现实,这种能够扩大视野、突破传统的研究,为我们重建中国基础教育提供了宝贵的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宋娴博士对博物馆与学校合作的研究,在理论和现实意义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宋娴是我指导的博士生,本书系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撰写而成,是她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术成长的见证。入校伊始,宋娴便将终身教育、科学场馆与基础教育的交叉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大量文献研究工作;同时,她还深入实践,积极参与科学场馆教育活动的研究及设计,在实践中推进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知行合一。如今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书稿,正是她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结晶。感动于她的勤勉,我很乐意接受她的邀请,为本书作序。我和宋娴博士一样,非常期待读者在分享本书的同时,贡献你们弥足珍贵的意见和建议。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

杨小微

2015年5月

序二

PREFACE

从20世纪末期开始,“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等成为世界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在这股教育思潮之下,人们开始意识到,教育不能也不应仅仅定位于学校这个狭窄的范畴之下,应当注意对学校的职能边界进行调整,将人类的教育在社会中还原。本研究所关注的中国博物馆与学校合作(以下简称“馆校合作”)机制的构建,正是在此大背景下进行的一项具体的探索。

作为终身教育的开始阶段,学校教育的边界应当被予以重新界定,其基础性应当体现为“为年轻一代终身学习与发展奠基”(杨小微,2009);与此同时,博物馆教育的职能边界,也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社会教育”范畴,它同样可以和学校教育一道,为人的终身教育以及构建一个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奠基。博物馆与学校之间,不应当存在壁垒森严的教育角色划分,两者之间的理想状态是一个共生发展的形态;在终极意义上,博物馆与学校都属于具有教育功能的公共机构,都指向于人的全面发展,都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纽带和基础。

从提出《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开始,中国教育便开始了一个缓慢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终身教育被界定为一项基本教育方针;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继续将终身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然而,无法忽视的现实是,这些终身教育的论述仍然是在传统的“普通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等框架下进行的;博物馆及其他社会教育资源和教育实践与国民教育体系之间存在着隔阂、壁垒。我们认为,这是需要重新加以界定和改善的。本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在中国当前的教育背景下,打破博物馆与学校教育乃至国民教育体系之间壁垒的一种微小尝试,也是对于国家教育战略目标以及相关政策导向的一个呼吁。

此外,一方面,馆校合作的未来需要上层宏观制度的引导和规范;另一方面,馆校合作作为创新型的教育实践活动,同样也应反映时代的特征。在现在这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博物馆与学校之间的合作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物理层面,数字化的沟通管理方式、信息资源平台的构建,对于馆校之间的共生发展而言,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总而言之,馆校合作体系的构建,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全新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教育之未来,而这也正是教育之于人、之于社会的意义。

上海科技馆馆长

王小明

2015年5月

内容摘要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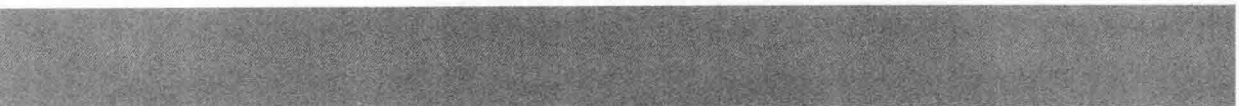
馆校合作是20世纪兴起的国际教育和博物馆领域的革新运动,体现了现代博物馆的公共属性和教育转型,同时也体现了国际教育改革的潮流以及学校职能边界的调整。从20世纪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后期一批新型的现代博物馆的建立以及课程改革运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博物馆群体与学校群体合作的尝试。基于此,本研究以中国馆校合作的历史、现状、主体行为、制度构建为主要线索,通过文献研究、访谈调查、质性及量化实证分析、理论建模等多重方法,对中国馆校合作进行了整体研究,以期获得在中国情境下对该问题的新发现和新理解,以及可能的未来建构路径。

本书第一章为绪论。该部分首先对研究的背景、选题缘由及意义进行了简要说明,继而“对馆校合作”等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对目标、框架、方法等进行了介绍,同时,对中西方馆校合作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第二、第三章对中西方馆校合作的历史脉络、宏观背景、必要性、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探讨,认为现代馆校合作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从宏观角度看,中国馆校合作的必要性包括教育资源的稀缺属性,博物馆与学校的公共属性,学校职能和博物馆职能的有机耦合以及获取外部资源、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等因素。但当前馆校合作的制度存在供给不足和目的错位、行政驱动属性较强、中国博物馆与学校内部的异质性问题,阻碍了馆校合作的深入开展。

第四、第五章是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利用扎根理论、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等质性、量化分析技术,对中国馆校合作的现状、类型、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动机等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当前中国馆校合作与国外相比,仍然处于起步状态。虽然各方对博物馆的教育职能较为认可,但馆校合作的主要形式较为初级,临时性和投机性较强,发起对象单一,合作不均衡。不同群体对馆校合作的态度以及馆校合作的效果,是一个相互制约的过程。馆校合作存在“搭便车”等现象,存在安全、距离、人数、教师绩效考核、学生学业评价制度、资金、人力、管理、观念等影响因素。

第六章对包括馆校合作内部管理者与执行者、博物馆与学校组织、馆校合作组织与政府机构在内的三组重要利益相关者,在馆校合作中的互动关系以及行为演化影响因素,进行了



量化分析,并认为:不同主体的收益、投入、合作意愿、彼此间的行为选择以及馆校合作的初始状态是影响馆校合作最终演化结果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条件下,馆校合作会呈现多种演化结果。

第七章在前文对馆校合作的现状、主体关系、合作行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西方馆校合作经验,构建了包括投入、运行、监督、激励在内的一般馆校合作机制,认为馆校合作中利益相关者行为的规范和改进以及具体合作实践的有序稳定发展,必须以相关合作机制作为保障;在构建馆校合作的机制时,必须充分考虑各类具体机制的复杂性。

最后,对研究的结论、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进行了总结,并对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

目 CONTENTS 录

序一	1
序二	3
内容摘要	4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馆校合作研究的背景	1
第二节 馆校合作研究的意义	5
第三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6
第二章 中西方馆校合作相关研究述评	11
第一节 西方博物馆教育及相关理论的研究综述	11
第二节 西方场馆教育研究的主要趋势	16
第三节 影响场馆教育的相关因素综述	20
第四节 国内相关研究	24
本章小结	27
第三章 西方馆校合作的脉络、现状及启示	28
第一节 西方馆校合作的历史演进	28
第二节 欧洲馆校合作的案例与分析	33

第三节 西方馆校合作的经验与启示	44
本章小结	48
第四章 中国馆校合作的脉络及宏观背景	49
第一节 中国馆校合作的历史演进	49
第二节 中国馆校合作的宏观背景	53
第三节 中国馆校合作的政策供给及存在问题	56
本章小结	59
第五章 中国馆校合作的现状及探究	60
第一节 研究的目标、思路与方法	60
第二节 数据收集和样本描述	63
第三节 中国馆校合作的现状及问题梳理	70
第四节 中国馆校合作现状探究	77
本章小结	89
第六章 中国馆校合作中的利益相关者及关系类型	90
第一节 馆校合作中的各类利益相关者的一般分析	90
第二节 馆校合作中的基本主体关系类型	98

CONTENTS

本章小结	104
第七章 博物馆与学校合作的行为演化分析	105
第一节 合作行为演化的基本假设和模型	105
第二节 馆校合作组织内部管理者与执行者的行为演化分析	109
第三节 博物馆与学校组织间的行为演化分析	113
第四节 馆校合作组织和政府间的行为演化分析	120
本章小结	126
第八章 中国馆校合作机制的构建	128
第一节 馆校合作的投入机制	128
第二节 馆校合作组织的运行机制	132
第三节 馆校合作的评估监控机制	139
第四节 馆校合作的激励机制	143
本章小结	148
结语	149
后记	150
附录	152
图录	185
表录	187
参考文献	188

第一章 绪 论

“终身教育”自诞生以来,逐渐成为世界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并调整着传统“教育”“学校”等概念的边界。在这股教育思潮之下,人们开始意识到,教育不能也不应仅仅定位于学校这个狭窄的范畴之下,应当注意对学校的职能边界进行调整,将人类的教育在社会中还原。终身教育与其说是具体的实体性概念,不如说是新型社会整体教育观念的体现。而在此背景下,游离于传统国民教育体系之外的博物馆等社会机构,开始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从20世纪开始,国际教育和博物馆领域兴起的馆校合作运动,一方面,将博物馆传统的收藏、陈列职能转向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服务,促进了博物馆的职能转型;另一方面,对于教育改革而言,馆校合作引入了新的外部资源和可能的合作空间,重新界定了学校的职能边界。与此同时,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一批新型现代博物馆的建立以及20世纪末期开始的学校教育改革,也出现了一些博物馆群体与学校群体合作的尝试。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试图运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的博物馆与学校群体的合作行为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以期获得在中国情境下对该问题的新发现和新理解,以及可能的未来建构路径。

第一节 馆校合作研究的背景

一、终身教育理念以及“教育”的重新发现

本研究将终身教育思潮界定为馆校合作最为根本的教育背景。正是在终身教育理念的观照下,传统学校教育制度得以被问题化,继而引申出如何由学校教育的现实困境出发,与传统作为“学校教育外机构”的博物馆的合作,找寻改进学校教育的一个可能途径。尽管在现实学界使用中,终身教育时常和继续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职业教育等普通学校外的“传统社会教育体系”相关联,但笔者认为,终身教育在本质上体现了“教育对生活的回归”(杨小微,2009),其根本在于使教育和生活、社会相互联系,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对于传统

学校教育而言,其主要作用应体现于如何为学生的终身可持续发展奠定基本的学习能力,并强调学生的“兴趣”“能力”“态度”等多元教育产出。正是在终身教育理念下,传统学校教育的弊端逐渐显现,如:以学校为中心的国民教育结构,难以整合社会整体教育资源;学校对于知识的过分强调,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实际相去甚远,难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学校教育不能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基。中国学校仍然需要在变革中进一步厘清自身在整体社会教育系统中的定位,同时在调动学生学习动机、安排学习内容等方面进行反思和调整。

而事实上,博物馆正是这一职能革新的良好促进者。首先,这源于博物馆独一无二的教育(或者课程)资源。从博物馆将教育职能作为自身的核心职能开始,博物馆的服务范围便不仅仅面向于社会普通群体。更为重要的是,学校同样也可以通过利用博物馆的教育资源来促进教育内容的改革和更新。在中国,除了各类历史文化类博物馆外,自然、科技类博物馆,都可以充当这一外部课程资源的有效载体。由于博物馆在物品整理、收集上的优势,这些资源相比于学校资源,具有直观性、稀缺性等特点(Hein, 1998)。而在此基础之上,通过设定相关独立的课程或者学习计划,可以有效地将这些课程资源融合到学校自身的资源内容中。其次,博物馆学习具有传统学校学习无可替代的特点和作用。博物馆学习(museum learning)是重要的非正式学习形式,这种非正式学习是基于真实问题的、在具体情境中展开的,与学习者的经验世界直接相关联,有助于实现知识的迁移(Bitgood et al., 1994)。同时,博物馆学习强调探究过程(Hein, 1999),这种探究式学习和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不谋而合,有助于培养学生开放的科学态度和知识理念。除此之外,相比于传统学习,博物馆学习在动作技能习得、兴趣培养、知识理解、社会学习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Lord, 2007)。因而,在中国终身教育体系以及全民学习型社会的大背景下,引入博物馆作为学校教育的合作对象,重新整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学校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除了终身教育思潮所带来的要求外,新的社会现实发展同样也要求中国学校进行回应。伴随着知识经济越来越受到重视,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信息技术的革新,社会职业结构的更新,终身教育思想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教育作为社会的基础要素,既是这一变革的组成部分,也在深刻影响着这场变革。教育改革被视为实现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有效途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对社会产生的新的变化,许多国家纷纷启动了涉及课程、学校制度、教育行政等在内的全方位改革计划,意在提升教育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力。例如,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启动了“学科结构运动”,又从80年代开始发布了《国家处在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美国竞争力计划》等法案,从核心课程、绩效评估、学校选择、特许学校等领域,对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变

革。日本、欧洲国家等也兴起了类似的教育革新计划(周琴,2007;范国睿,2008;周满生,1999)。

日本学者藤田英典(2001)对当今时代的教育变革进行了如下概述:首先,知识基础在当今社会产生了新的变化,信息能力、批判能力等受到了新的重视;学校不再被视为最终的知识获得场所,而是一种促进学生未来学习、终身学习的基础性机构;与此同时,学校的秩序也从传统的层级制度转为民主化构架;最后,学生的学习动机,从外部、强制性动机转变为内部动机。中国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除了资源投入的持续增加外,还施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靳玉乐等,2004):更新教育内容,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经验及社会的联系,转变课程管理模式,以学习者的经验和社会问题为中心来进行课程整合,强调学生的问题意识、创新和实践能力,转变学习者的学习方式。所有这些改革在理念和整体设计上,都契合了世界教育变革的整体趋势,为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与此同时,中国学校教育改革仍然面临着一系列后续问题,其中教育资源的开发、拓展以及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联程度,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众所周知,学校教育在现代社会并非一个独立的系统,其发展与变革受制于外部条件,同时其具体的改进也应与社会可能的条件相结合。在中国,虽然强调了学校内部课程资源的改革,但教育系统相对于其他社会系统而言,仍然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教育和社会之间远未达到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终身学习时代所要求的契合程度。因而对于教育变革而言,引入适当的外部社会主体,重新调整学校自身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馆校合作仍存在较多现实问题

从现实角度看,虽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开展各种课外及校外活动”已有四年多的时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颁布亦有近14年的时间,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大多数馆校合作实践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当前中国的馆校合作大多合作规模较小,合作领域狭窄,合作成本较高,同时,运行、评估机制也有待明晰和规范。这些实践是否科学合理,如何进行优化和规范,如何更好地同学校现有课程系统衔接,如何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的引导和反馈,也是极为现实的问题。为此,必须对中国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行为进行系统、规范的分析 and 理论构建,解决实际行动中缺乏本土化理论研究的问题,从而推动合作行为更好地展开。这对于促进中国博物馆整体功能转型,推进现行教育改革,乃至提升社会整体科学素养和国家创新能力,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此外,中国馆校合作还存在如下较为普遍的问题。首先,合作主体的积极性尚待提高。在中国的馆校合作中,很多博物馆与学校没有意识到馆校合作的真实价值,也没有将馆校合作与校外活动等教育范畴区分开,同时,转变自身教育理念也较为缓慢。此外,中国馆校合作

还受到学校实力、教育发展意愿、博物馆发展状况、支出结构、资金充裕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内外部条件都影响了博物馆与学校在馆校合作中的行为取向。其次,中国馆校合作还面临合作效率及合作成本的障碍。基于种种因素,在馆校合作中,博物馆与学校各自的管理者和执行人员、政府、家长、学生等基本主体之间缺乏合理有效的沟通渠道,彼此之间进行合作的成本较高,影响了馆校合作的效力。同时,现有馆校合作由于缺乏完善的决策及评估机制,往往无法约束或者有效预测各个主体的行为,可能导致“搭便车”或者投机行为的出现。第三,合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不够。在中国的馆校合作中,由于自身条件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博物馆与学校的基本行为动机往往是较为短期的利益,同时,由于管理者的更迭、上级领导的偏好等因素,导致馆校合作往往没有形成较为长期和稳定的合作关系,而重建馆校合作关系也需要重新付出大量的前期成本,从而使得馆校合作实践具有投机性。

四、博物馆的兴起与发展为馆校合作提供了契机

从词语起源上看,博物馆一词始于古希腊语“mouseion”,其含义是“侍奉缪斯”。缪斯是掌管知识和艺术的女神,早期博物馆亦即“知识和艺术的神庙”,主要是收集、保存与文化、科技相关的藏品,同时,也是学者从事科研和艺术创作的地方,这是博物馆最原始的职能的表述。事实上,“贮存和收藏各种自然、科学与文学珍品或趣物或艺术品的场所”一直是传统意义上博物馆的核心职能。博物馆的教育职能转向起源于其公共属性的延伸。从18世纪大英博物馆的建立开始,博物馆开始面向普通公众开放,并开始呈现出公共属性。建立在这一公共属性的基础之上,在20世纪,世界博物馆的核心理念已重新界定为“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一系列社会因素的作用之下,尤其是伴随着终身教育等社会教育理念的诞生,博物馆被赋予了巨大的“教育”期望和关注。例如,1990年,美国博物馆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 AAM)将“教育”和“社会服务”定义为博物馆的核心职能;1998年,英国教育政策蓝皮书中也将博物馆视为“社会知识增长的核心场所”,并重视与参观者建立持续而长久的关系。

而在中国,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政府在文化、科技领域投入的增加,中国博物馆在数量上呈现增长趋势。截至2011年,全国博物馆总数已达2700多座(国家统计局,2012)。在此期间,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学会以及中国博物馆学会等相关专业组织也开始建立。同时,博物馆在发展上更加多元。例如,兴建了一批科技馆、科学中心、天文馆、艺术博物馆等新型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在理念、设施、陈列等方面相比传统苏联模式的博物馆都有了较大改进。以科技馆、科学中心为代表的新型科学场馆,实际上应和了世界科技类博物馆从注重展览、展示到以教育为目的的发展转型。尽管新型博物馆的建设仍存在一些问题,但至少在自身资源、设施、布局上具备了更有利于开展教育活动的条件。同时,作为公共机构,博物馆与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公共属性,两者的根本目标都是致力于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和知识的增长。这也为中国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做了铺垫。

五、馆校合作研究是中国教育发展、科学传播的现实要求

正如上文所言,中国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行为,不仅仅是博物馆拓展自身服务职能的过程,也是一个教育问题,理应得到广大教育学者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现代博物馆的诞生,博物馆的公共属性使其教育责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越发凸显(Hooper-Greenhill, 2007)。博物馆在自身的发展中,已经将自身的职能从原有的收藏、保存、陈列逐渐转向社会公共意义上的教育职能,是整体社会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具体现实条件下,中国博物馆自身教育职能的实现仍面临众多困难和障碍,这其中既包括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障碍,也包括博物馆在自身理念层面难以与普通学校融合,两种系统之间存在文化差异。与此同时,现代教育作为一个综合的系统,决定了学校不可能独自承担起全部的教育职能——其隐含的事实是,学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受到诸多外部主体、条件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教育系统产生了急剧的变革和转型,这使得外部教育资源的引入成为急迫的议题。因而,中国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行为是一种综合而复杂的行为,需要从全面而综合的视角及实证意义上对该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解读,这也正是本书的主要意义所在。

第二节 馆校合作研究的意义

在中国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基本实现普及的前提下,除了公平、结构布局等宏观议题外,在质量层面上,中国教育仍然面临着教育理念滞后、教育方式陈旧、学生学习产出单一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学校教育自身的改革和课程调整之外,社会教育力量的引入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在当前背景下,博物馆与学校合作是改进中国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现有的馆校合作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尚存许多亟待厘清或解决的实践议题。基于此,本研究对中国馆校合作进行了调查及实证分析,对于了解中国馆校合作的现状,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在馆校合作中的行为、动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馆校合作行为的推演及合作机制的构建,为中国馆校合作的规范化提供了可能的理论依据。具体而言,中国馆校合作的主要实践意义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促进社会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及开发利用

对于馆校合作而言,最为直接的实践意义在于促进社会整体教育资源的整合。由于博物馆在藏品收集、整理上的优势,加上其公共机构的属性,其资源往往蕴藏着巨大的教育价值,这些资源理应被同为公共机构的学校所共享、利用和开发。但在现实条件下,由于主体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外部制度供给不足,两者往往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合作行为远未达到理想

的状态。本研究通过建构馆校双方的合作机制,使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资源得以通过相对较为规范的机制介入国民教育系统,促进其社会效益的扩大。本研究试图呼吁当前中国的教育决策部门及文博管理部门对馆校合作行为给予更多的关注,对可能阻碍现有合作的制度性因素给予更多的关注,使中国博物馆与学校都可以在规范、合理的制度框架中,寻找到合作的最优路径,促进社会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协调。

二、助推学校教育的有效尝试

对于馆校合作的研究,是助推学校教育的有效尝试,尤其是在为在校学生拓展学习环境及提升资源价值等方面。当前,中国学校教育在学生学习兴趣、教学手段、探究创新等方面仍然存在提升空间。而博物馆作为现实世界的具象和再现,同真实情境、经验世界密切关联。在学校教育中引入博物馆,将其视为具体学校变革的催化剂,在当前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研究试图通过规范的实证研究过程,对学校教育内部的相关主体进行较为细致的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找寻现存的障碍及可能的解决途径。

三、凸显外部公共机构的教育功能

本书中所开展的馆校合作研究,其实践意义在于提醒外部公共机构在学校教育乃至全民学习型社会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在当前中国,不仅是文化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科技馆、科学中心、天文馆、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等广义上的博物馆可以同学校展开合作,而且公共图书馆、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NGO)等也在扮演重要角色。各类机构同学校进行合作,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研究虽然主要关注的领域为博物馆,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以为其他社会机构提供借鉴。

第三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一、博物馆与学校

1. 博物馆

博物馆和人类早期的收藏行为密切相关。早在公元前2000年,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就出现了收藏奇珍异物的行为。西方古代早期最为典型的博物馆行为,当属亚里士多德对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过程中收集的奇珍异宝的整理和研究;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托勒密·索托一世除了继承了这些珍奇藏品外,还专门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创建了一所“缪斯神庙”(mouseion),用以收藏奇珍异物以供学者进行研究,而这所“缪斯神庙”也被视为古代博物馆形成的标志,同时,